

離散、帝國與嗣王： 論鄭經《東壁樓集》的文化意蘊

林津羽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提 要

本文以鄭經《東壁樓集》為中心，嘗試闡發其書寫策略與自我形象，及其游離在遺民／嗣王雙重身份間，所開展出的對話與多義性。藉此觀察鄭經如何在離散的狀態，在帝國與島嶼的縫隙中，以種種儒學詩藝及策略式書寫，尋求個人的文學、歷史定位。當詩歌文本成為解讀與詮釋自我形象的場域——位居帝國邊緣的遺民／嗣王鄭經，正通過中原（中國）與島嶼（臺灣）的相互依存，巧妙建立起自我的主體性與表述空間。

關鍵詞：鄭經 《東壁樓集》 離散 遺民 在地性

離散、帝國與嗣王： 論鄭經《東壁樓集》的文化意蘊

林津羽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崇禎（朱由檢，1611-1644）自縊煤山，明朝覆亡。二月餘後，南明弘光朝於南京匆匆成立，卻因黨派傾軋、內德不修等因素，一年後即告崩解。稍後的唐王隆武（朱聿鍵，1602-1646）雖有中興之望，亦未能力挽狂瀾，維時僅兩年。南明諸王國祚均短，惟「永曆」（1646-1683）一朝廷續近四十年之久——此需歸因於鄭氏父子的出現。鄭成功（1624-1662）奉明正朔，經營東南沿海；鄭經（1642-1681）賡續父志，遙奉永曆帝。鄭氏父子前後相承，竟使南明國祚奇異地延長了二十年。

鄭成功終身不事二姓，自屬遺民。然鄭經的歷史形象遠較其父複雜，清代郁永河（1645-?）《裨海紀遊》載之：「成功歿於康熙元年，子經繼立（經即錦舍）。經紈綺子，無遠略，……。」^①或以清廷立場論斷。鄭經歷史定位不明，與其行事爭議有關。其所著《東壁樓集》以佚名故，更鮮有人知^②。鄭經生於崇禎十

① （清）郁永河：《裨海紀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頁10。粗體為筆者所加。

② 今所藏《東壁樓集》作者署名為潛苑主人，長久以來被視為永曆帝朱由榔的作品。朱鴻林考證後，方定作者身分。見朱鴻林：〈鄭經的詩集和詩歌〉，《明史研究》第四輯（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12月），頁212-230。2002年龔顯宗〈鄭經撰《東壁樓集》考〉又提出若干證據，

五年，國破時方二歲，本不應躋身遺民之列^③。但歷史巧合使之「世襲」了「遺民」身份，並終身誌之。王德威《後遺民寫作》提到「遺民」不只是一種身份（identity），更是一種狀態、心態，是歷史錯位的結果，其擺盪在實際政治之外，並在時間的剝蝕下，備受考驗^④。遺民抱持舊有的帝國認同與身份，頑強的與新朝共存，雖被「故國」所棄，卻也因此證成自身的存在意義。其中，流亡海外的遺民尤為特殊，憑藉著異鄉的資源，他們得以「不食周粟」；卻在帝國邊緣，熱烈的想念故國，在其詩文及行事中徹底體現了中心與邊緣對話的可能。

明清臺灣文學研究向以順治六年（永曆三年，1649）漂流來臺的沈光文（1613-1688）為初祖^⑤，然沈氏留存詩文極少，不若鄭經豐富。朱鴻林〈鄭經的詩集和詩歌〉與龔顯宗〈鄭經撰《東壁樓集》考〉前後二文，確立《東壁樓集》的作者身份，具有重要意義。今所見相關研究已有數篇，或側重集內的忠義之作，或連結詩中特定的孤獨意象，卻罕見討論《東壁樓集》特殊的刊刻時間，及文學作為一種技巧的整體性思考。鄭經《東壁樓集》存詩近五百首^⑥，寫作時間橫跨十年，起自永曆十八年（清康熙三年，1664）退守臺灣，至二十八年（清康熙十三年，1674）隨軍出海時刊出，是一種關於遷移（migration）、離散（diaspora）的

支持朱氏論證。見龔顯宗：〈鄭經撰《東壁樓集》考〉，《臺灣文學論集》（高雄：高雄復文出版，2006年10月）。

- ③ 清初遺民向有「遺民不世襲」的氛圍，連乾隆亦作此想。又清廷對明鄭的態度亦可見諸乾隆年間所編《逆臣傳》，據陳永明〈《貳臣傳》、《逆臣傳》與乾隆對降清明臣的貶斥〉一文指出：「從清人的觀點而言，任何沒有明室宗藩作為領導的抗清活動，都只能視作一般的地方叛亂，情況與其他經常出現在中國歷史上的『寇盜』並沒有兩樣。基於這個前提，臺灣的鄭氏政權，與其他南明抗清隊伍應加以區分，而不能混為一談。」見陳永明：〈《貳臣傳》、《逆臣傳》與乾隆對降清明臣的貶斥〉，《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頁256。
- ④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11月），頁6。
- ⑤ 本文標註明朝滅亡（指崇禎自縊的1644年以後）以降的年份，是衡量其人的國籍與降清與否，另再標註西元以供對照。
- ⑥ 本文採用（明）鄭經：《東壁樓集》（臺北：龍文出版社，2011年，《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八輯）。此版本有評點與自序，完整保留詩集原貌。隨文標註頁數，不另行出注。

流亡詩學 (poetic of exile) ⑦。筆者以為欲闡發鄭經《東壁樓集》之價值與意義，或可借鑒嚴志雄談論明遺民詩學 (poetics of Ming loyalism) 時的用法。嚴氏在《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一書中提出敘事真實 (narrative truth) 與歷史真實 (historical truth) 的區別 ⑧，筆者借鑒此說，結合鄭經《東壁樓集》及其出版時間，檢視其中的書寫策略與論述主軸。

鄭經《東壁樓集》經常回應遙遠的帝國，是以離散、流亡的主體身份，開展對帝國的熱切「想像」，也正在帝國、島嶼之間所開啓出的對話與協商空間 (third space of negotiation) ⑨，能見出其主體性 (subjectivity) 所在 ⑩。就身份 (identity) 而言，鄭經游離在遺民與延平世子、嗣王的「雙重身份」間，其認同與自我建構的複雜性頗值得考辨。本文首節以《東壁樓集》的儒門意識為主，詮解〈自序〉的忠孝意指，旁及於評點，一睹鄭經為讀者指引的方向及其詩歌情志。復次，勾勒鄭經所處情境，並回到詩集內部，解析其所開展的詩學美感與自我建構。最末，結合上述諸論與詩集的生成語境，以人與詩、帝國與在地性的對話交流，直探其中的價值與意義。

二、華夏文化在東寧：《東壁樓集》的儒門意識

鄭經在歷史上的形象與定位頗為困窘，無論是與幼弟乳母私通產子、抗拒父親的譴罪、排拒其父曾禮遇的遺老（如沈光文）、參與三藩起事而失敗，甚或是兵敗後日近醇酒婦人的頹倒，都壟罩在背離儒家倫常的強大陰影下。然而，其詩

⑦ 筆者此處所云「流亡詩學」是依鄭經複雜的生存與心理狀態立論，相關論述詳見下文。

⑧ 詳參嚴志雄：《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臺北：聯經出版社，2012年5月）。

⑨ 此處所云協商空間或譯為第三空間，主要來自後殖民論述。意指兩種文化的交互作用所產生出新的空間、結構與活動。在混雜的過程中，它挑戰的是單一的認同與文化。在鄭經一例中，並不能單純以遺民身分立論，嗣王與其激盪出的新視角，在在賦予《東壁樓集》以新的意義。對此術語的運用與詳細論述，詳見下文。

⑩ 主體性泛指人的主觀能動性，放在本文來看，近於鄭經如何藉寫作證明自身的存在價值與意義。這個對「我」的思考方式，在《東壁樓集》內的表現又被筆者區分出敘事真實與歷史真實。有關主體性的討論眾多，此處暫不贅述。

不僅指引後人截然不同的方向——一個充滿山水隱者、思婦閨怨與忠臣隱士的多重面貌，更是華夏文化在東寧的複現。《東壁樓集》是鄭經刻意留存的文本，涉及複雜的寫作策略（writing strategies）與自我形象（self image），並充滿主動建構的詮釋空間。本節聚焦《東壁樓集》的主要思想、內容、形式與評點，並將詩文本與評點視為有機組合，抉發後者對文本所生發之意義。筆者意欲指出，鄭經以儒家意識作為《東壁樓集》的書寫策略，是通過傳統多義、歧義的詮釋法則自我指涉，循此梳理其寫作技藝，頗能一睹詩中的幽微之處。

據嚴志雄所述，「明遺民體詩」或說「明遺民性」專指詩的情韻、表達與企圖，其內涵通常關注對故明的哀愁、悼念、回憶、愧疚與悲憤等情緒，而非實際的政治認同與操守出處。這種專注在文本自身的發展與進路，側重意義構築進程（process of signification）^①，適可為本文重要的觀察進路。

（一）言志：忠孝之思

《東壁樓集》刊刻於三藩起事初期，是時鄭經響應吳三桂（1612-1678）等人，陸續占領泉州、漳州與潮州，聲勢頗佳。此中心志，可一睹其自序。〈自序〉節錄如下：

每讀書史忠孝之事，未嘗不感激思奮。……及先王賓天，始出臨戎。肆守東寧，以圖大業。但公事之餘，無以自遣，或發於感慨之時，或寄於山水之前，或托於風月之下，隨成吟詠，無非西方美人之思。日者虜運將終，四方并起。余爰整天師，直抵閩疆。思恢復有期，毋負居東吟詠之意。乃命官鐫刻，而名曰東集，以明己志云。（〈自序〉，頁1-3）

作者以「西方美人之思」定調《東壁樓集》，並連結於忠孝之思。西方美人典出

① 此處所云意義構築進程係指作者以隱喻性的意義與體系，賦予詩歌某些無法直指的、隱晦的情志，而不能直接等同於歷史真實。在側重文本的隱喻、形式、功能等諸種前提下，或說筆者更強調的是作者對文本的賦義過程。嚴志雄：《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頁16。

《詩經·國風·邶風》，實指為何，尚無定論。或從朱鴻林之說，以為代指吳三桂；或從龔顯宗之說，以為永曆帝，莫衷一是¹²。此處筆者傾向將之視為一種正統的象徵¹³，目的在自陳《東壁樓集》寫作的正當性與忠孝之思。戰事初捷，鄭經洋洋自得，充滿期待，故言「思恢復有期，毋負居東吟詠之意」。此前，鄭氏遷臺，不受時人諒解，據廖一瑾《臺灣詩史》載：「煌言乃遣部將羅自牧（子木）赴東都，並遺書於王司馬忠孝、沈御史佺期、徐中丞孚遠，皆在延平軍中，請其同勸延平移師西指，未果。」¹⁴張煌言（1620-1664）是南明抗清名將，曾與鄭成功會師進擊，集內另有〈感事四首〉、〈得故人書至自臺灣二首〉與〈致書羅子木〉均反對遷臺。其時反對鄭氏攻臺的說詞中，或以其有自立之心，或因臺灣蕞爾小島、地處偏遠，無助反清。這些反對與質疑，幾為《東壁樓集》刊刻時的潛在語境，是鄭經力圖破除、平反的對象。故此役若能成功，除可重振其父之名，回應率軍來臺時，所面對的諸多責難（盡孝），更可佐證鄭經歷十年光陰仍未改變的赤誠（盡忠）。《東壁樓集》之刊刻正如同這場戰事被寄寓的諸多期待，意義重大。

鄭經在〈自序〉中，略去私德與繼位風波，賦予書寫的正當性，充滿強烈暗示。在其筆下，繼承先王、先父遺志謂孝，存西方美人之思為忠，這個有意識的

¹² 朱鴻林〈鄭經的詩集和詩歌〉論西方美人有二解：一曰王者，一曰賢人。朱氏以為永曆既死則王者之說不可能，推論西方美人代指吳三桂。龔顯宗〈初論《東壁樓集》〉以為吳三桂反覆無常，而鄭氏行文有一貫脈絡，此仍應指被絞殺的永曆帝。筆者以為三藩之亂時，鄭經與吳三桂連成一氣，但無法就此連結文本與實際政治。

¹³ 明末在詩中曾以「西方美人」託寓者，不獨鄭經一人，據吳翊良《南都·南疆·南國——南明（1644-1662）遺民詩中的「南方書寫」》所述，尚有錢謙益與徐孚遠。見吳翊良：《南都·南疆·南國——南明（1644-1662）遺民詩中的「南方書寫」》（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3年1月），頁72-74。

¹⁴ 廖一瑾：《臺灣詩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3月），頁94。黃美娥〈臺灣古典文學發展概述（1651-1945）〉提及：「就地理空間的書寫言，盧若騰（1600-1663）雖不曾踏上臺灣本島，但為表達反對鄭成功取臺作為反清復明基地，其在《島噫詩·長蛇篇》中將臺灣想像為長蛇之窟，警告眾人不可來臺。」黃美娥：〈臺灣古典文學發展概述（1651-1945）〉，《海峽兩岸臺灣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2004年8月），頁432-433。

賦義過程，形構《東壁樓集》的書寫策略，顯而易見的是，隨著〈自序〉所展開的正是主體抗辯、回應與自我建構的歷程。

（二）比興傳統的紹繼

「忠孝」是儒家奉行的行動方針，亦是鄭經在《東壁樓集》具體「言志」的方向。而〈自序〉所云：「但公事之餘，無以自遣，或發於感慨之時，或寄於山水之前，或托於風月之下，隨成吟詠，無非西方美人之思。」不脫「寄託」手法，閨怨詩或為最佳示例。

《東壁樓集》的閨怨題材，計有〈閨思〉、〈閨苑〉、〈君不來〉、〈罷鏡〉與〈覽鏡〉等十餘首，論者對之解釋不一¹⁵。一般以為鄭經既為延平嗣王，絕無採用君臣之喻的可能¹⁶，但一方面，敘事真實究竟不等同於歷史真實，否則〈自序〉的寄託之說，無以落實；另一方面，閨怨詩的寄託說，與鄭經在《東壁樓集》內的自我建構不脫關聯。故筆者仍傾向回到文人習慣的詮釋傳統——君臣比喻來解釋。下試析〈閨思〉一首，試引詩如下：

閨中遙相思，寂寞倚玉樹。憶昔當年時，幸喜獲良遇。共枕席未溫，又欲裝行具。別君意難留，淚落如春雨。揮馬從軍去，昂昂登前路。妾歸空房裏，苦情竟莫訴。念君在邊庭，朝夕其誰顧。身役王家事，敢思不敢怒。望君榮歸里，騎從如雲護。須念糟糠妻，莫負更新娶。（頁3-4）

¹⁵ 如阮筱琪認為是代言體，而蘇奕璋則以為是自我投射。見阮筱琪：〈論鄭經《東壁樓集》中的孤獨感〉，《有鳳初鳴》第5期（2009年10月），頁174；蘇奕璋：《明鄭時期臺灣遺民詩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6月），頁103。

¹⁶ 曾玉惠〈鄭經詩歌作品中女性形象分析〉一文云：「鄭氏生前名義上的君王，事實上都沒有管束駕馭他的權力，他不可能有如曹植那樣的經歷，所以他並沒有以棄婦相比的逐臣不堪處境，而在作品中說及『為臣良獨難』，以逐臣與棄婦比附相憐的詩旨，以男女比君臣的模式並不適於解釋他的作品。」詳見曾玉惠：〈鄭經詩歌作品中女性形象分析〉，《崑山科技大學學報》第5期（2008年3月），頁118。

上詩是典型的閨怨題材，由相思起筆，漸轉入回憶，僅以四聯敘寫相遇與離別，並通過邊庭與空房的對比，拉出距離感。行人征戍於外，思婦寄寓「朝夕其誰顧」的疑問，表深情也。這首模糊具體時間與人物的閨怨詩，是否為鄭經自道，需檢視其中譬喻的相似性，以建立內在連結。全詩批語有二，分別是「身役王家事，敢思不敢怒」與末聯「須念糟糠妻，莫負更新娶」，前評為「性情深厚，能識大義」，後者云「又結到本身事上，妙」。前者闡發詩意，稱揚女子性情；後一批語則讀出詩中人物與作者際遇的相似性，可以視為某種自由聯想。

在書寫與詮釋策略上，《東壁樓集》中的鄭經雖據有藩王之位，卻非竊國之臣，〈自序〉云「思恢復有期」，已自我定調。在這個前提下，思婦／鄭經才有詮釋與類比的可能性。其〈和李正青不遇空怨歸依偕字韻〉（頁56）尤應做此解。李茂春（?-1675），字正青，為鄭成功參軍，永曆十八年隨鄭經來臺¹⁷。依詩題所云，李正青必有一述己不遇之詩，而鄭經和之。惜李氏之作今已不傳，無以稽考。《東壁樓集》除序文外，用「美人」一詞唯有三處，（另見於〈春遲柳暗催〉與〈美人曉妝〉），此詩是唯一與美人梳妝無涉的比喻用法。詩言不遇，開篇先述遇合，是常見手法。次聯用「美人」一詞，代指前兩聯所指稱的「知己」。依香草美人之喻與李正青生平而論，唯鄭經不以君王自恃，斯有此和不遇之詩。鄭經詩中的「君」，作為虛指，既用以象徵正朔，也藉之突顯人臣的處境。循此，可檢視〈罷鏡〉一詩，一窺鄭經之操作。引詩如下：

二十往年時，鏡與人俱妍。三十歲來節，面色同鏡薦。人情冷暖態，亦與鏡相連。羞對舞鸞影，無奈把鏡捐。（〈罷鏡〉，頁14）

〈罷鏡〉寫美人遲暮，既是代言、擬仿，亦可能出於鄭經自比。全詩雖未寫思婦堅貞的姿態，然推其遲暮之感，或出於生不逢時，故云「人情冷暖」。全詩有批語「似真似謔，似怨似慕，寫出兒女情性」，所謂「似真似謔」，或可參酌鄭經

¹⁷ 楊惠南：〈明鄭時期臺灣「名士佛教」的特質分析〉，《臺灣文獻》第53卷第3期（2002年9月），頁1-38。

生平。永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1662年），鄭經入臺取得政權，年二十一。兩年後，鄭經退守臺灣，作《東壁樓集》。永曆二十八年，鄭氏參與三藩之役，時三十三歲，正為詩中所述情境。又感悟內容為「人情冷暖」，詩用孤鸞舞鏡一典，寫君子失群。恰如這十餘年間，復明之士的蕭條¹⁸。另可參酌〈登樓〉與〈曉思〉二詩，前者云：「世事時更改，人情日違遷。」（頁235）後者言：「人情反覆路行難，愁思任是千飛絮。」（頁297）顯然《東壁樓集》內人情反覆云云不僅出現一次，而近乎居臺期間的感慨。

《東壁樓集》中，思婦／鄭經的類比，不僅於此。如〈臨風憶故人〉與〈夜懷〉二詩（頁170、281），均用宋襄王之典，以妾自比。思婦之喻非僅見於閨怨詩，尚見於〈王昭君〉一首。引詩如下：

薄命佳人出塞遙，掖庭明詔配天驕。卻將心緒寄愁弄，漠漠風沙望漢朝。
（〈王昭君〉，頁294-295）

《東壁樓集》內歌詠歷史人物者唯有此詩與〈贊漢高帝〉，頗為罕見。王昭君於晉時避司馬昭諱，又喚「明妃」。此詩另有批語「末語意景無限」，似有深意。佳人薄命，遠徙胡戎，是歷史典故。然「卻將心緒寄愁弄，漠漠風沙望漢朝」，則賦予明妃脈脈含情之意。明妃所望無非「漢朝」¹⁹，漢與「滿清」相對，鄭氏此

¹⁸ 前有明史案於康熙二年正式結案，株連甚廣，江南遺民士氣大衰。永曆十八年（清康熙三年，1664）至二十八年（清康熙十三年，1674）間，有張煌言於康熙三年被捕犧牲，浙東一帶近二十年抗清之舉終歸失敗。後有遺民林古度（1580-1666）、方文（1612-1669）、方以智（1611-1671）、歸莊（1613-1673）、祁班孫（1632-1673）等先後謝世。鄭經雖未盡知遺民際遇，然彼輩久居清廷統治之下，或降或死可想而知。

¹⁹ 王昭君是明清之際的熟典，李惠儀〈明末清初流離道路的難女形象〉云：「無可否認，馬上琵琶，塞外黃沙，天涯漂泊，穹廬暮笳等意象，王昭君和蔡琰的比擬，是亡國與殺伐的『淒婉化』。」李惠儀：〈明末清初流離道路的難女形象〉，王瓊玲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年10月），頁153。此外，文人如夏完淳、陳子龍也運用此典。見孫慧敏：〈天下興亡，「匹夫」之責？——明清鼎革中的夏家婦女〉，《臺大歷史學報》第29期（2002年6月），頁68。

作，有其心思。

相較於〈閨思〉寫征戍造成的別離，又有〈君不來〉寫君子失期，詩云「愁腸莫可寄，聊作數字裁」（頁12），至於〈別離同夜月〉有句云「不得長相隨，皆由妾命蹇」（頁16），皆凝聚在貞婦怨而不怒的形象。在開放、模糊的詩語境中，「妾」身未明。但對明君的呼喚與一貫的等待姿態，正足以彰顯思婦／鄭經此一類比中一貫的忠貞態度。對比同時期明遺民的後續抉擇，唯有鄭經能秉持初衷，寫此中的等待。此種不同的遺民經驗，使之能操作詩語的多義性，投射為閨怨諸作。

鄭經閨怨諸作以美人為政治託喻的對象，是以比興手法，直承《詩經》以降「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寫作傳統。而其代換「思婦」、「美人」等語，立基於堅實的文學傳統，時而自喻（閨怨諸作），時而喻明君（西方美人），顯然又隨語境而更易敘說位置。「君」在此作為正統性的象徵，對應鄭經「臣」的委婉自道。所謂西方美人之思的使用意圖，此處略可知矣。

（三）復古詩評與讀者聲音

鄭經《東壁樓集》的儒門意識，是透過詩中的忠孝思想與隱喻寄託的比興手法來建構完成。而其復古思維的支配與儒家詩學意識之關聯，又見於集中評點。

《東壁樓集》內的點評處達四百二十六首，評點少則一字，多則四十字。評點作為詩集的衍生物²⁰，與這部具有特殊目的之作品，保持了緊密關係。此種蔓生、茲衍的品鑑特點，見之於評點的詩教、復古詩觀與對詩人風格的總體性評價。如〈閨怨〉詩評「怨而不忘，自有深情」（頁8）、〈覽鏡〉詩評「思而不怨，哀而不傷，有風人之遺」（頁37），全係儒家詩教溫柔敦厚的複現。

《東壁樓集》的評點者身份不詳，今無定論²¹。整體而言，詩評短小乏議論，

²⁰ 詳參楊玉成：〈後設詩歌：唐代論詩詩與文學閱讀〉，《淡江中文學報》第14期（2006年6月），頁63-131；楊玉成：〈小眾讀者：康熙時期的文學傳播與文學批評〉，《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9期（2001年9月），頁55-108。

²¹ 黃騰德以為評點者是戶官楊英，因其隨行出征，有閱覽之便。見黃騰德：《鄭經詩歌研究——以〈東壁樓集〉為探討重點》（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頁46-48。然楊英生卒年失載，評點語氣又與其下屬身分殊不相襯，僅能存疑。

以賞析爲主，較少對字法、句法與章法的分析。句讀與佳句處間用「、」與「○」，又有「氣韻」、「聲韻」、「音韻」、「風韻」與「餘韻」諸詞，缺少詳細說解。評點者主要針對詩作的內容意旨下綜合短評，偶及於對句與結構。若干評「落落」、「瀟灑」、「清灑」、「洒落」等語，直指詩人情性，傳人意味濃厚。評〈孤雲亦群遊〉詩，云「說遊雲入微，但語似太淒冷」（頁128），或評〈夏雲多奇峰〉一詩，云「太黏題，然自切」（頁154），似與文本、作者商榷，也未顯苛刻。又集內二十餘處語及「古」字之評釋，復古意識頗爲鮮明。此處「古」之釋義，涉及風格的點撥與廓清。如評〈幽人〉一詩云「有晉人風味，不類齊梁後語」（頁137）、評〈花葉隨天意〉云「有宋人理致，卻不落宋人窠臼」（頁188）。所謂「古」，不含齊梁與宋，區辨意味濃厚。若干評點提及某詩不僅可雜於唐人之作，甚至可上溯古詩十九首，如「無謂而有妙，有漢魏樂府遺意」（頁270）、「古拙，極似唐作」（頁269）等語，都涉及文學史的定位（position）。從詩評所稱道的標準，可知其以唐人爲法，又以盛唐爲宗。如〈晚歸故園〉詩末評有「渾古之中，時出警句。藏奇於隱，藏秀於拙，直接盛唐以上」（頁41）、評〈雨過觀花〉詩云「行雲流水，一氣到底，自是排律所難，盛唐而後，此道不傳久矣，此令人懷古之情益深」（頁229），這種穿越今古，逕以《東壁樓集》上承盛唐，凸顯詩集、評點者祖述與追法的對象。

評點貌似中立，仍不脫文本附庸，其欲拒還迎的姿態，彰顯在謳歌作者詩藝之精熟的幾則評點，如評〈催粧〉詩，云「結語風流蘊藉，用事當家」（頁130）、評〈清溪一道穿桃李〉云「落落寫景，卻句句有穿桃李在，此爲大家手筆」（頁227）、評〈夜坐聞雁得情字〉與〈秋日閒居即事得低字〉，皆以排律當家名之。又制題與詩句間的關聯，偶有發揮，如評〈荷風送香氣〉，云「語語切題」（頁213）。但承王偉勇〈鄭經《東壁樓集》借鑒唐詩析論〉一文的結論²²，《東壁樓集》有百餘首用唐人詩題，另百餘首是直接摘取唐人詩句而來，其比例之重，表現文學傳統的繼承與嫁接。而評點對此襲用，卻隻字不提。綜言之，《東

²² 王偉勇：〈鄭經《東壁樓集》借鑒唐詩析論〉，《詩詞越界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9年），頁141-193。

壁樓集》之評點純以抉發作者本意、闡發詩人情性、風格為主，並無意疏解詩歌內部的詩學特色與細密的技巧問題，縱有對詩作商榷處，亦下轉讚嘆，又語多溢美，偏向傳統的印象式說解²³。

詩教言溫柔敦厚，重比興寄託，倡忠孝思想，正為《東壁樓集》所採之書寫策略。明祚滅亡，政治上的失意無可復返，遂予鄭經以種種託寓、象徵筆法，寄意現實，建構一純然文字世界的《東壁樓集》。《東壁樓集》以儒家詩教為書寫策略，此固與明鄭政治、文教措施不脫關聯，於其刊刻之時，亦有正大光明之意。事實上，鄭經搬出經典——古的價值，置諸晚明詩壇絕不特殊。倒是以他未曾在晚明詩壇正式登場來看，更像是借用古典宣言，標榜自我的信念、主張與意識，乃至於表明自身對詩壇論辯的存在感。當鄭經選用熟悉的唐詩製題，使之易於進入唐人經典價值，此既彰顯作者的鑑賞與洞見，也在重新製題中，彷彿躋身文學史的神聖殿堂。

三、隱者與遺民：主體再建構

「邊緣」向來容易為人忽略，在明末清初，海上孤島——臺灣亦如是，此相較於陸地論述而言。依陳永明〈《貳臣傳》、《逆臣傳》與乾隆對降清明臣的貶斥〉一文所述，在失去朱明血裔為號召的那刻起，鄭經與其勢力早已被滿清及其官方歷史視為地方叛亂。迥異於此，鄭經在《東壁樓集》挪用諸種文學傳統符碼，融攝自身形象，以此抗辯自我的正統性。典故是對歷史記憶的召喚與重塑，每次挪用都透露主體的欲望、投射與想像，此或為敘事真實與歷史真實之間隙由來。而文字示現的時空背景與諸多人物意象，疊合了過去的歷史記憶，能輻射出話語

²³ 鄭經師承的脈絡並不清晰，一般以其師事徐孚遠（1599-1665）。見黃騰德：《鄭經詩歌研究——以〈東壁樓集〉為探討重點》，頁19。徐孚遠字闇公，幾社六子之一，以古文、時文譽當世。幾社以復古為傾向，詩以盛唐為宗，亦不廢齊梁與中晚唐之詩，獨不取宋以降、公安與竟陵，並以比興手法上承風、騷。

主體的理想身影²⁴。是故，與「邊緣」共在的隱者與遺民，成為鄭經主體建構時的相應座標。本節先勾勒鄭經所處歷史背景，次觀察其如何藉由隱者與遺民二形象，展現文化再敘事的形構力量。

（一）明鄭與臺灣

歸順抑或反抗，這是甲申之際中國士子面臨的一道難題。降清者固不待言，抗命者又何去何從？無論是逃於禪、隱於山或矢志抗清者，都必須從新面對自我身份、處境的改變，離散（在內心或實際境況下）自此而始。離散，意味帶著分裂與越界的經驗，在異地展開新的生活²⁵。離開母體，勢無可免的與之疏離，因而帶著原始的精神創傷，印入其生命與作品中。而流亡者離開業已成形的文化場域，帶著割裂的痛苦，也必須重新建構自我的認同（identity）、身份與信仰，其所遭遇之困頓，想當然爾。在明清易代之際，就出現這樣一批流亡者。明清鼎革，部分士子懷抱復國期待，或前往海外乞師，或避居異地，如朱舜水（1600-1682）遠徙日本²⁶、越南的海外明鄉等²⁷。明遺民的流亡生涯，意外發展出多樣化的文化交融，已得論者關注。鄭氏軍隊是其中一隻引人注目的隊伍，根據地是當時的臺灣。

鄭氏與明朝的關聯可溯至鄭芝龍（1604-1661）——清初貳臣。鄭芝龍長期據有東南海上貿易利益，在南明弘光朝與唐王隆武年間兩度被冊封²⁸，權傾朝野，隨即在順治三年（1646）降清。而其子鄭成功在崇禎十七年（1644）赴南京，拜文

²⁴ 鄭文惠提到話語主體的建構，是經過自我與他者的遇合，其中經歷諸種抗辯、協商與轉化等，才能確認主體的位置。見鄭文惠：〈後遺民時間／地理政治學：溥心畬台灣風物之文化敘事〉，《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13期（2013年2月），頁1-60。

²⁵ 高文惠：《後殖民文化語境中的庫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7月），頁25。

²⁶ 相關研究可參呂玉新：〈有關朱舜水研究文獻目錄〉，《漢學研究通訊》第23卷第4期（2004年11月），頁21-37。

²⁷ 李慶新：〈「海上明朝」：鄭氏河仙政權（「港口國」）的中華特色〉，《濱海之地：南海貿易與中外關係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4月），頁339-353。

²⁸ 彭孫貽《靖海志》：「（乙酉）晉封芝龍為平虜侯，尋封平國公；……賜芝龍長子森國姓，名成功，封忠孝伯。」（清）彭孫貽：《靖海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2月），頁8。

壇宗主錢謙益（1582-1664）門下。隆武元年（1645）賜國姓「朱」，改名「成功」。永曆三年（1649），改奉永曆年號為正朔，被冊封為「延平王」²⁹。永曆十三年（1659），率軍攻入長江，東南大震，惜久攻不克，無功而返。兩年後，謀取臺灣以備後勤補給。永曆十六年（康熙元年，1662）四月，桂王被絞殺，五月鄭成功亦急病而逝。

鄭成功經營臺灣的時間雖短，卻備受推崇。對鄭成功而言，臺灣是後援補給的基地、反攻的跳板，然對隨軍來臺的文人士子，其意義遠非如此，於其子鄭經尤然。鄭經是嫡長子，接管其父勢力是首要，其次是繼承父志與否。據夏琳（生卒年不詳，約活動於明末清初）《海紀輯要》所載：「（癸卯十七年、春）正月，招討大將軍世子至自東郁。世子□□內難，祭告先王，調諸將分守各汛；……。是年，永曆訃至；世子猶奉其正朔，稱永曆十七年。」³⁰鄭氏內部在鄭成功死後有繼位風波³¹，最終鄭經自行宣布襲封延平郡王，遙奉永曆帝，並於十七年（1663）十月退守臺灣，維持近二十年的統治。

十七世紀以前的臺灣（此指狹義的臺灣本島），鮮少進入帝國語言的表意系統中（澎湖則較早被指稱，元代時已設巡檢司）³²。西元一六二四年（順治八年），荷蘭被明巡撫驅離澎湖，轉而佔據臺灣。一六二六年西班牙入侵臺灣北部，至四二年被荷蘭驅逐。此時期的臺灣全屬荷蘭轄下，名喚「福爾摩沙」（Formosa）

²⁹ 「（丁酉十一月）永歷遣漳平伯周金湯、太監劉國柱航海至閩，進成功為延平王，晉封潮王。成功欲破金陵，然後稱王，固辭不受，文書告示只稱令旨而已。」（清）彭孫貽：《靖海志》，頁41。

³⁰ （清）夏琳：《海紀輯要》（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33。缺字為原文所缺。粗體為筆者所加。

³¹ （清）彭孫頤《靖海志》載之甚詳，見（清）彭孫頤：《靖海志》，頁61。據汪鏞鍾（生卒年不詳，同治年間人）所輯之《明延平忠節王始末》，時鄭成功之弟世襲陣營中曾與使者言：「世子亂倫，先王再命賜死，不悔過自新，而反統兵據國，使先王引恨而死，護理仁慈勇敢，承兄遺命繼統，誰敢逆之？」（清）汪鏞鍾：《明延平忠節王始末》（北京：線裝書局，2003年10月，據清末至民國間抄、民國23年朱希祖校改本影印），頁485、487。

³² 《靖海志》：「（辛丑）正月，成功議取臺灣。……。周袤三千里，與土番雜處。萬山環抱，中有膏腴平地數百里。故無君長，饒布粟桑麻，百物互相貿易。山多金銀，無所用，人民饒樂，不知甲兵戰鬥。」同前註，頁56。粗體為筆者所加。

——一個非漢族名稱的指稱。在荷屬東印度公司將臺灣視為商業據點後，鄭氏是第一個進入臺灣的漢族政權。此前的臺灣雖有西拉雅族、在地住民與部分漢人，但無中央政權的統轄³³，此點在鄭氏政權來臺後一變：

（甲辰、明朔永曆十八年）世子至東都，以諮議參軍陳永華理國政。改東都為東寧，置天興、萬年二州。分諸將土地，課耕種、徵租賦、稅丁庸、興學校、通魚鹽，安撫土民，貿易外國，儼然別一乾坤。³⁴

上文概括臺灣在鄭經轄下的發展，也代表臺地從此進入帝國語言的表意系統中。鄭氏軍隊與隨軍來臺的文人在此地想像、生活，另闢一種有別於中原的遺民論述。特別是康熙四年（1665，永曆十九年），清廷遣施琅（1621-1696）征臺灣，卻遇風而還，此後十餘年不復有征伐之舉³⁵，更給予明鄭發展的時間與空間。

（二）自我建構：隱者

《東壁樓集》除有十餘篇閨怨之作，更多描寫山水隱逸，論者對此詮解不一³⁶。依〈自序〉所述，即使是山水之作，也有所寄託。鄭經在山水、行遊詩裡隱括

³³ 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臺灣地，原土番居之，不知所自始。至明季，漳泉人始徙而混居。……土番之俗，其性頑蠢，無姓氏，無祖先祭祀。自父母而外，無伯、叔、甥、舅之稱。不知曆日，以草青為歲首，亦不知其庚甲。俗尚勇，好殺人。暇即習走，走日數百里，不讓奔馬；足皮厚數分，履荊棘如平地。」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頁3。

³⁴ （清）夏琳：《海紀輯要》，頁36。

³⁵ 夏琳《海紀輯要》：「乙巳，明朔永曆十九年夏四月，清加水師提督施琅靖海將軍，統舟師進攻東寧，遭風引還。……尋召施琅歸旗，加伯爵；其餘投誠官兵，移駐各省，設兵防界，不復以東寧為事。」同前註，頁36-37。

³⁶ 如阮筱琪以為反映鄭經愛好自然、熱愛山水的隱士情懷。見阮筱琪：〈論鄭經《東壁樓集》中的孤獨感〉，頁178。而黃騰德《鄭經詩歌研究——以〈東壁樓集〉為探討重點》以為山林之作反映鄭經對年少時讀書廈門的眷懷。黃騰德：《鄭經詩歌研究——以〈東壁樓集〉為探討重點》，頁79。二說側重山林滌蕩胸懷之效用，以調和鄭經的負面歷史形象。

傳統隱逸符碼，看似不著痕跡的標誌個人志趣，實則拚合素琴、藜杖、石床、竹蒲與荷裳多種隱逸符碼，展現主體再建構的文化敘事。如〈江亭〉的「帆飛還浦澱，聲鬧出樵漁」（頁 146）與〈野居〉句云「漁父與樵童，時時頻相顧」（頁 46），是隱逸傳統內漁樵意象的再利用。至若〈漁父詞〉與〈樵父詞〉（頁 93；45），對個別漁、樵生活與人物的描寫，也應該被放在此一脈絡下理解。鄭經在「明月當窗映，披衣拂素琴」（〈山房來晚景〉，頁 145）、「閒行溪澗策藜杖，獨坐石床擁竹蒲。」（〈雲臥留丹壑〉，頁 193）、「聽韻松間倚竹杖，尋芳花下擷荷裳」（〈山中作〉，頁 254）、「荷衣開竹戶，藜杖步山蹊」（〈雪滿空山難認鶴〉，頁 130）與「日落閒行頻倚徙，滿目江山一塊視」（〈秋江花月夜〉，頁 77）等詩，組構漁隱傳統內屈原《楚辭·離騷》「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³⁷、《楚辭·哀時命》「然隱憫而不達兮，獨徒倚以徜徉」與陶淵明策杖臨皋等重要事典³⁸，突顯自我認同。漁隱傳統除可遠溯姜太公「願者上鉤」的意象，屈原行吟澤畔及與漁父有所去取的一番問答，皆是《東壁樓集》的隱藏脈絡。此尤可見於鄭經〈卜居〉一詩。「卜居」一題本於《楚辭》，內容描寫世事混濁，君子無所去從。屈原往見太卜不過藉此自陳心意，而陶淵明〈移居〉詩所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³⁹，也回應此一脈絡。鄭經串縮屈原與陶淵明二人形象，探問仁人君子之所從，類此的文化敘事再建構，既是主體的自我投射，也充分表現在集內祖述陶淵明、杜甫等歷史人物之寫作手法。

在隱逸傳統內的眾多人物與意象裡，鄭經偏取陶淵明系列典故，如〈容軒宿雨初晴晚景〉（頁 114）、〈幽人〉（頁 137）、〈山燕夜月〉（頁 230）與〈竹間窺戶月〉（頁 154），間用陶淵明葛巾漉酒、〈飲酒詩〉與〈歸去來辭〉諸意

³⁷ （戰國）屈原著，黃靈庚集校：《楚辭集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1月），卷1，頁92。

³⁸ 同前註，卷14，頁1522；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4月），卷5，頁461。

³⁹ 袁行霽：《陶淵明集箋注》，卷2，頁130。

象。陶淵明入宋後更名「潛」，或說其義熙以後唯書甲子，帶有遺民色彩⁴⁰。揆諸《東壁樓集》之所以標舉陶淵明，似非偶然。如「步月頻看不覺還，猶如迷入桃源路」（〈徐步〉，頁 82）、「沿溪深入忘遠近，疑是昔日桃源家」與「武陵舊徑難重覓，頻問舟人道亦忘」（〈深谷有人家得家字〉，頁 110）、「花下問漁舟」（頁 212），皆引陶淵明名篇〈桃花源記〉。至若〈江村〉一詩更隱括〈桃花源記〉全篇而成。避秦／清，是明清之際的遺民熟典⁴¹，此一用法也令人聯想至鄭經「潛苑」之命名。

即使位居嗣王，鄭經在《東壁樓集》中時以隱者自況，這個看似矛盾的現象正凸顯主體再建構的複雜性。〈一室〉句云：「世俗真堪避，空山結茅區。……。家無一日積，甌中多生塵。……。放縱無所畏，窮愁讀殘書。……。流星四野墜，狂風吹敝廬。驟雨忽傾注，屋漏無安棲。寒風侵葛屨，渾身覺淒淒。垂足無乾地，一室盡溼泥。」（頁 32）前半用《後漢書·范冉傳》所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之典⁴²，後隱括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在隱者形象中，暗藏知命安貧的儒者情懷。此種以隱者自居、有所不為的文化敘事，既見於〈江頭酌別〉與〈感遇〉（頁 196；209），也反映在隱士題材上，如〈招隱〉一詩尾聯云「暮天車馬鬧，栖鳥復驚還」（頁 146），以「鬧」字評價俗世之干擾，而非以嗣王身份讚頌招隱的正當性。

鄭經既為嗣王，卻以隱者自居，需溯及漁隱傳統內的「不遇」意涵，方可明瞭箇中原因。「寂寞橫漁釣，逍遙扣角牛」（〈屏跡〉，頁 224），鄭經用姜太公「願者上鉤」與寧戚飯牛之典，士不遇心理呼之欲出。據王偉勇〈鄭經《東壁樓

⁴⁰ 鐘優民總括陶淵明研究中，「隱逸」與「忠晉」是其中的兩大主題。見魏正申：〈對陶學兩大癥結——「隱逸」與「忠晉」的創釋——鐘優民先生治陶貢獻論〉，《九江師專學報》1995年第4期（1995年），頁3-8。

⁴¹ 宋元之際汪元量即作此表述。據謝崇熙《清初明遺民的「屈陶」論述》一文，至少有陳王廷、薛正平（《明遺民錄彙集》）、屈大均、王夫之、方以智與驚隱詩社諸人，見謝崇熙：《清初明遺民的「屈陶」論述》（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2008年6月），頁9、19。

⁴²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5月），卷81，頁2689。

集》借鑑唐詩析論》一文所論，唐詩中鄭經最常引用的對象是杜甫，其次是王維與李白。鄭經取法盛唐，似有明代復古之風，而其所引用之杜甫，尤以一飯不忘朝廷的忠君形象流傳後世。此外，杜甫不遇於君主，時以「草舍病夫」與「白髮老翁」自況⁴⁹，在儒者情懷中暗藏某種不同於俗的人格特點，也屢見於《東壁樓集》。非但〈茅屋爲風破得發字〉與〈暮雨愁猿聲〉本於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暮雨愁猿聲〉（頁 70）、〈秋笛〉（頁 29）、〈春日渡江遊望〉（頁 88）與〈幽林歸獨臥〉（頁 96），皆以衰頹形象出現。鄭經結合杖藜、病夫、野老與漁樵等意象，在〈題東壁樓景自敘〉直陳不遇，乃因「昔日先朝一漢臣」，遺民認同自此明矣。伴隨隱者與遺民定位的意象群尚有鄭經對松、菊、蘭、竹等描寫，如「堪稱松栢操，終歲不殘凋」（〈寒江動碧虛〉，頁 125）、「兩岸荻蘆俱淒菲，徑邊殘菊傲霜枝」（〈秋盡〉，頁 66）、「幽谷青蘭銷晚」（〈幽林歸獨臥〉，頁 96）與「夜靜無朋語，空邀抱節君」（〈風泉夜聲雜〉，頁 122）等語，都是文學傳統中自我惕勵與比德的植物意象。

《東壁樓集》是鄭經唯一可見的作品集，箇中充滿主體再建構的象徵符號，陶淵明固是其一，亦不乏屈原與杜甫的身影。在道家隱逸情懷的深層，隱藏儒家的用世心理，也唯有鄭經對自我「不遇」的詮釋，可以解釋這些意象群的安排。鄭經在山水行遊詩裡，疊置特定人物與植物意象，寄意自我理想，此正是〈自序〉所云的有所寄託。鄭經貴爲嗣王，卻逕以隱者自比，可以視爲對自我寓居東寧的解釋。在三藩之役中，某種師出有名的正統性與正當性，就通過文學傳統的比附被連接起來。

（三）遺民心緒

隱者、遺民是《東壁樓集》內形象建構的核心，發之爲詩，展現出多種面向，

⁴⁹ 蘇怡如〈杜甫成都草堂詩之隱逸書寫析探〉：「然而，有趣的是：當杜甫談及自己的生活狀態時，卻常常使用典型的隱逸符號來描述其生活並自我定位。如他每以野老、野人、釣叟、狂夫、潛夫等指涉隱逸身分的詞語自稱，並時引著名隱士陶潛（365-427）為同調。」見蘇怡如：〈杜甫成都草堂詩之隱逸書寫析探〉，《國文學報》第 53 期（2013 年 6 月），頁 121。

最鮮明的是《東壁樓集》內頻繁出現孤、獨二字，以獨字入詩有三百餘處，並集中描寫獨酌、獨醉、獨行與獨坐等狀態。《論語·泰伯》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⁴⁴故明已亡，滿清無道，隱居勢所必然。當永曆的覆亡讓南明劃下句點，鄭經卻在文本中將紀年往後遞延，〈自序〉落款「永曆甲寅歲夏六月潛苑主人自識」，是典型遺民話語的展演、政治選擇與形象建構的一環。時間作為《東壁樓集》重要的閱讀脈絡，潛藏了作者的身分認同與書寫策略。當鄭經以隱士姿態，宣告遺民堅持，詩中因之出現兩種迥異的時間感，一是光陰不斷流逝，象徵被時間拋擲的孤臣與遺民狀態，充滿焦慮與不安，甚可被類比至思婦情境，如〈初冬〉的「歲月催人人易老，紅顏等君君不來」（頁80）；一是永恆的四季遞嬗、萬物各安其命，是隱者所處的時間與日常生活，如〈樵父詞〉的「世事任安危，歲月相終始」（頁45）。兩種時間感所帶來的身心分裂與不平衡時常隱藏在詩中。《東壁樓集》以「心」字入詩者多達三百餘處，凡有「忠心」、「客心」、「憂心」、「無心」、「傷心」多語，雖偶見「心清」、「舒心」、「會心」之詞，然鮮明的存在感象徵了某種幽暗、緊張的主體意識，必須被反覆安頓。鄭經成為「遺民」或許切合儒家的忠孝思維，然其實指與焦慮，卻不斷糾纏書寫主體。〈江山非故園〉其一句云：「故園深趣猶堪賞，舊國中宵還入夢」（頁190），直指離散中的懸念。其二則云：「江山景色雖然異，風月清輝萬里同」（頁191），進一步展現認同的周折。而〈偶見題〉與〈偶吟再續〉雖以「偶」字命題，卻在孤獨中有所寄寓，流洩鄭經深層的意識。這種期盼回應，卻毫無音信的沉重感，往往發為孤獨哀傷，徹底體現遺民被遺棄的存在感。如〈不寐〉（頁38）詩寫群小亂國，百姓、中原遭屠戮之厄。又用起舞、擊楫語，暗伏詩人之志。極其弔詭的是，遺民的存在感，來自被王朝所棄。當戰事拉長，西征之日遙遙無期，等待分外煎熬。

觀察《東壁樓集》內政治正統性與合法性的確認，是通過明君與忠臣兩意象的相互指涉，標誌自我的忠貞形象。然「遺民」身份與認同既明，存續反成考驗。

⁴⁴（魏）何晏著，（宋）邢昺疏，（清）阮元校勘：《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頁72上。

〈讀喜達集有感依諸公韻成篇〉（頁 100）清楚表現了對時間流逝的感觸⁴⁵。「喜達」一詞，或出於杜甫〈喜達行在所三首〉，詩自注「自京竄至鳳翔」。本詩開篇云「避塵島上春十更，諸人半屬朝公卿」，時間約在永曆二十八年（清康熙十三年，1674）前後。時帝祚斷絕，距離盧若騰與郭大河諸南明遺民《喜達集》成帙的時間、背景也已渺遠。斯人已遠，鄭經所感所嘆既對郭大河諸輩所發，又未嘗不是自身寫照。對比清初急於納降的貳臣，正是在復明之志的「移」與「不移」間，加上時間向度，才顯得「明鄭」與「遺民」身份之存續，變得難能可貴。

鄭經在《東壁樓集》內，以大量的山水行遊主題，寄寓其隱世情懷，間挪用文學傳統內特定的植物意象與高潔的隱士典型，以自我象喻。在屈原、陶淵明與杜甫的人格典範中，鄭經嫁接儒家式的用世情懷，既爲了烘托「士不遇」的心理，也藉之傾訴內在的孤臣與遺民情感。伴隨遺民認同而來的孤獨、惆悵與期待落空，以其複雜的心緒，共構了遺民的情感結構，徘徊不去。而詩中兩種並行的時間感，既象徵遺民被先朝、故國所拋擲的斷裂，反之也見證身份存續的種種幽微。待時而起，因而成爲孤臣強烈的企圖，正如〈自序〉之所寄意。

四、鄭經的雙重身份

鄭經《東壁樓集》以深具淵源的文化傳統，建立自我的文學與歷史定位，其意義則在遺民與嗣王雙重身份中獲得深化。鄭經於滿清之外別據一島，然此非其政治理想，於《東壁樓集》作山水田園等詩，頗有「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之志，間以閨怨、思婦表現一往情深的姿態，以此完固自我的遺民形象。在時而奮發，時而慕隱的書寫中，遺民心境層層剝落，其形象也顯得更爲豐滿。然而，《東壁樓集》內許多悖反，除透露鮮明的遺民意識，還有某種統治經驗，指向作者本人

⁴⁵ 《喜達集》內容今無考，唯盧若騰《島噫詩》中有〈喜達集序〉。順治四年（永曆元年，1647），盧若騰偕郭大河（生卒年不詳）、傅象晉（1625-1647）等諸生起義武安。序文首述此因緣，繼勉郭大河西征，決意赴行在之志。若依此序，則《喜達集》內容或不脫諸輩勗勉詩之集匯。

的雙重身份。「明遺民」，是鄭經的身份認同，而「嗣王」卻是此際得以維持之基礎。按明制，「郡王」並非世襲⁴⁶，但永曆既亡，誥封已成懸想。鄭經「自行宣稱」襲封嗣王，既使其正當性遭受質疑，也無可迴避身為統治者的種種追問。

《東壁樓集》內的聲音因之流轉在兩個位置，時而人臣、時而遺民，或假閨怨傳統以自述，或藉隱逸人物以自比，在若隱若顯間，又流露嗣王的自矜。「明遺民體詩」本不容自矜自喜，而鄭經的自我揭露既可能出之於政治動機，也可能是更強烈的形象主導。穿越此種間隙，可以見出話語主體的滑移，也是移民／嗣王的創構。本節通過《東壁樓集》內和詩、宴樂與祈雨諸作，一探嗣王語境及詩中「遺民性話語」的意義。

（一）在地性：孤島上的嗣王與遺民

《東壁樓集》內有六十二首和詩，唯其唱和對象，除陳永華（字復甫）、李正青、柯儀賓（生卒年不詳）與馮錫範（字康甫），今已無考。觀察集中的和作，以尋幽探訪為主，或為舊題見賦。其中，唯〈秋閨月得暮字〉與〈秋閨得秋字〉二首的閨怨主題，是同時期寓臺文士所僅見。這可能是以鄭經為中心的文學唱和，對傳統母題的重視，甚或思婦、閨怨主題的解讀與擬代，本易形成一種帶有寄託的共通話題。類此動用文學傳統的意象，猶見諸詩中孤雁與猿吟意象。此外，寄意客居悲哀，或如〈冬夜旅懷得字〉與〈夜坐聞雁得情字〉（頁 59；245），以客自稱，對應鄉關之情，無非是寓臺文士的集體情感投射。明清之際渡臺文士的下落，據唐立宗〈渡海東來忽幾秋：明清之際渡臺文士的見聞與際遇〉一文所云，頗多歸隱⁴⁷。但集內如〈酬故人還山得身字〉（頁 256）與〈醉後寄山中友人得山字〉（頁 256），都顯示這無礙彼此的交往。明鄭時期，除李正青築有夢蝶園，據

⁴⁶ 《明史》卷 100〈諸王世表〉：「茲表明代親王至郡王而止，以從史、漢諸王及王子侯之例。又仿唐宗分房法，繫各府郡王於親王之下，如小宗之從大宗。其餘不得封者，概不載。」下註「郡王無子，兄弟及兄弟之子不得請襲，違者為冒封。皆萬曆七年例也。」（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6 月），頁 2503-2505。

⁴⁷ 唐立宗：〈渡海東來忽幾秋：明清之際渡臺文士的見聞與際遇〉，《臺灣文獻》第 65 卷第 2 期（2014 年 6 月），頁 125。

盧嘉興〈臺南古剎彌陀寺〉與釋慧嚴〈台灣佛教史前期〉二文考辨⁴⁸，竹溪寺、彌陀室與龍湖巖同樣創建於此時⁴⁹。名士、山僧與寺廟或因之成爲《東壁樓集》和詩的一環，見證彼時情景。是故〈過故人庄得轍字〉一詩，既可視爲單純的復古仿擬，或爲山中交往實景。詩中有句云「蕭蕭素髮青絲結，堂上高懸高士圖。席中佳肴金尊設，興歡未盡復登舟」（頁 101），此作較孟浩然原作突出高士與登舟兩元素，緊扣故人的性格特質，也回應東寧常見的水澤意象。故人歸去山中，是真正的隱者；獨我身陷名利場中，潛苑主人畢竟是嗣王，幽居不過是某種姿態。「聽政餘閒學作歌」（〈喜晴得月其一〉，頁 285）、「聽政餘閒覺寂寞，寄情山水墨翰筵」（〈東壁樓〉，頁 194），對日常活動的揭露，暗示隱居文本的虛構與身份建構的間隙。

《東壁樓集》內的在地性散落在微小細節，如〈雲間聽弄鳥〉、〈柳渚躍魚〉、〈花間蛺蝶醉芳歸〉、〈望隔牆花〉與〈江路野梅香〉等零碎的生活片段，累積成具體日常感。歡愉、宴樂均繫於鄭經嗣王身份，方可得到，而不見於同時期寓居臺灣的遺民詩人。如〈東樓宴舞〉二首（頁 289），起筆狀東樓之高，次敘舞姿，落筆含蓄。間用《史記》凌雲一典，恰似鄭經人君身份。東壁樓是嗣王鄭經遊憩之所，本具有政治意義，但這類歡宴場景⁵⁰，卻提醒了這是一個異質的空間，既相對於明代的衣冠、禮俗與人情，也迥異於清廷統治下的帝國，而是一個可以讓鄭經（等遺民）不薙髮、不稱臣的根據地——臺灣的在地性於焉迸發。

⁴⁸ 盧嘉興：〈臺南古剎彌陀寺〉，張曼濤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八）台灣佛教篇》（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釋慧嚴：〈台灣佛教史前期〉，《中華佛學學報》第8期（1985年10月），頁273-314。

⁴⁹ 《台灣府志·外志·寺觀（附宮廟）》卷九：「竹溪寺：在府治東南數里許，其間林木蒼鬱，溪徑紆迴，最為勝景。良辰佳節，騷客遊人多會於此。」「彌陀室：在附郭之東，庭宇幽靜，佛像莊嚴，傍植檳篁，名苑芬馥，可供遊詠。」「龍湖巖：在諸羅縣開化里，陳永華建，環巖，皆山也；前有潭，名『龍潭』。潭之左右列植楊柳、桃花，亭內碧蓮浮水，蒼檜摩空，又有青梅數株，眾木茂榮，晚山入畫。真巖居之勝境、幽僻之上方也。」（清）高拱乾：《台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卷9，頁220-221。

⁵⁰ 相對而言，鄭經詩中的燕樂之作數量並不多。朱鴻林以爲是之前私通乳媪受到責難後，有所收斂。筆者以爲此與書寫策略有密切關聯。

在地性可以是實指，也對應嗣王內在處境，前者彰顯在人文、風物與節氣等環節⁵¹，後者以特有的地理環境，具體落實「不食周粟」之所以成為可能。《東壁樓集》內若干詩題與內容，顯示鄭經的統治者身份，如〈和柯儀賓侍遊潛苑詠〉（頁 218）。儀賓是明代郡主夫婿的稱呼，侍遊二字，則說明彼此的身份與位階。而祈雨諸作，尤能「正確」反映統治者愛民如子的姿態（statue），此類詩計有〈望雨〉、〈喜雨〉與〈祈雨未應自罪，三章〉。在〈喜雨〉一詩，可以見出身為統治者的期待與定位，也牽涉一個在地化、不容忽視的存在經驗，茲錄詩於下：

永日憂焚望雨時，海天風電乍紛披。雲霓交集碧空暗，民物遍沾膏澤熙。
鼓腹高吟多稼曲，揮琴載詠芄苗詩。喜深夢寐轉驚覺，惟願年年勿失期。
（〈喜雨〉，頁 187）

明鄭時期率先發展的府城乾濕季分明，多仰賴夏季氣旋降雨，大抵是寫作背景。降雨攸關作物生長與百姓衣食，也指向古時領導者的責任。詩開篇寫等待降雨，言「永日憂焚」。下言風雨乍臨的天色變化，用「乍」字表之。降雨之前，起風、閃電，雲層密布，大雨將落。尾聯轉寫統治者的心聲，微帶隱憂。另有〈望雨〉（頁 173）用商湯與舜之典故，同樣表現為政者風調雨順的盼望。〈祈雨未應，自罪三章〉（頁 287）是祈雨主題中最具體的一首，望雨不至、祈雨未應，罪已在此作為一種政治修補的姿態⁵²，迥異於同時期寓臺諸詩人所作，以之收錄於《東壁樓

⁵¹ 《東壁樓集》內的臺灣風物，如貝類的「蛭」，見於〈和復甫詠蛭戲贈李正青〉、〈和李正青憂蛭懼讒得匿字〉與〈和復甫怒螺歌贈李正青依磧字韻〉三首。明清時期每於春夏之際在台江內海邊，可得蛭甚多。蛭生長泥沙中，以其味美，一名西施舌。李正青因喜好食蛭，而得鄭經戲贈詩一首。此外，鄭經在〈和李正青憂蛭懼讒得匿字〉亦以蛭為喻。全臺詩中以蛭入詩尚有謝金鑾（1757-1820）與何激（生卒年不詳）。謝金鑾於嘉慶年間來臺任官，其〈臺灣竹枝詞〉三十一首之二十云：「風味初嘗到竹蛭，江瑤應與共功名。……。」何激曾在光緒元年（1875）五月隨福建巡撫王凱泰來臺，作〈臺陽雜詠〉二十四首，其二十一云「竹蛭莫訝腥難近」。見「智慧型全台詩資料庫」（<http://xcm.nmtl.gov.tw/twp/b/b02.htm>）（上網檢索日期：2016年7月20日。）

⁵² 郭宏珍：〈古代官方祈雨考述〉，《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1期（2012年2月），頁70-77。

集》，恰佐證嗣王的統治經驗。

鄭經的身份際遇終與其他文士殊異，在其筆下人人安居樂業，儼然是另一個新生活的可能。這種詩意筆法既是嗣王的政治焦慮，也略略透顯遺民／移民樂土的再建構。類此心態，除在〈終日無心長自閒〉詩中，有句云「國中庶事分司掌，永日歌吟神自休」（頁176）、〈東壁樓〉句云「聽政餘閒覺寂寞，寄情山水墨翰筵」（頁194）與〈喜晴得月〉其一句云「巍樓細雨揜紅羅，聽政餘閒學作歌」（頁285），都暗示悠閒、愉悅與可控制的生活狀態，投射人君的成功統治。此因為《東壁樓集》被批評為在地性或現實感不足之因，然或可說家國尋根至此有了新的安頓，在地性因之而生。

東寧作為避秦／清的桃花源象徵，可從詩集的安排略窺一二：一是序跋向來具有提高聲譽的作用，《東壁樓集》則反常的缺少名流背書，唯有〈自序〉一篇交代寫作意圖。二是評點者不詳、出版地不明，甚至連作者姓字都被隱藏。隱藏的說話者——潛苑主人，蟄居於東寧島上，其待時而起的情感在詩文本與序中流轉，使整部詩集隱晦的佐證作者的漁隱形象，幾可視為《東壁樓集》敘事再建構的最末一環。鄭經層層包裹自我身份，只有在〈自序〉落款的年份「永曆甲寅」與詩文的字裡行間，能稍稍辨識隱者（作者）的「遺民」身份。

當明朝帝國缺席，神州大陸與臺灣兩地不同的氣候，說明了實存空間的轉換、裂變，鄭氏必然面對一種當下的實存經驗，反饋自身的政治認同。箇中關鍵不僅涉及遺民身份的存續，更指向鄭經的「在地性」。「在地性」的概念雖然可以檢驗政治正確與否，然在明鄭時期，何為臺灣主體性、在地性，顯然又複雜許多。在地性是一種相對於全球化的概念，同時可以輻輳出國族認同與主體意識等議題，楊宏任〈何謂在地性？：從地方知識與在地範疇出發〉一文提及，在全球化的語境下，在地性往往伴隨自我認同與歸屬感，是在邊界（boundary）內，區隔人、我，守護某種既定價值⁵⁹。正如〈自序〉所云，《東壁樓集》的核心意旨是忠孝，其地理邊界是相對神州大陸的「東」與「島」的概念。〈獨不見〉一詩句云：「胡

⁵⁹ 楊宏任：〈何謂在地性？：從地方知識與在地範疇出發〉，《思與言》第49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5-29。

騎一朝至，人人自爲變。我今興王師，討罪民是咎。組練熊羆卒，遵養在東洵。」（頁5），人人皆變，我獨不變，從中既定義他者（the other），也設定某種疆界。此種在地概念的細節處，如鄭經筆下遍在的漁家風光，反觀清廷自順治十三年（1656）起的禁海令、遷海令，可見差異。若從此一面向來理解《東壁樓集》，可發現在地性作爲鄭經隱蔽的生存經驗，遙相映照鮮明的帝國意識與詩人的身份認同。

（二）《東壁樓集》內的遺民語境與對話性

鄭經在《東壁樓集》內以儒家詩教爲詮釋法則，通過相思閨怨與山水隱逸兩大主題，循環往復的表現其所欲建構、言說的行動與意識。在《東壁樓集》中，現實生活的藩王爵位與理想中的企盼無法契合，處處流瀉閨怨與隱者情懷的「遺民性話語」。然而，將《東壁樓集》置入明亡二十餘年後的三藩起事現場來看，這種遺民話語（discourse）的延遲，暗含論述場域（field）中對權力爭奪的欲望（desire）與主體意識對自我定位（position）的焦慮。當《東壁樓集》透過儒門意識的層層包裹，重新開啓「正統」與否的討論時，其書寫本身就帶有抗衡官方論述之力量。

《東壁樓集》的特殊性源於鄭經的雙重身份，一在明遺民內年輩居末，一是身爲藩王。當鄭經選擇守節，並因此離散海外，勢必面臨身份抉擇與認同的問題。隨著當代遷徙狀況劇增，學界陸續開展國族認同與離散的討論。有關離散的定義，可大致歸納出受迫性遷移、繼起的失落感與歸返的障礙三重要素。此外，離散也涉及對單一國家認同的質疑⁶⁴。正由於此命題的豐富內涵，可以召喚出兩個互動性的場域，恰如鄭經筆下複雜的遺民／中國與嗣王／臺灣。

在所有明遺民傷逝與故朝／故國的情感，並擁有某種堅實回憶時，鄭經卻僅能操縱某些意象以回應，如〈贊漢高帝〉一詩。漢高帝爲首位漢人政權，象徵正統，可與「滿」相對。鄭經自居漢臣，寄意明君之意呼之欲出。然而「無限秋景

⁶⁴ Karla, Virinder S., Kaur, Raminder, and Hutnyk, John, Trans. Chen Yi-hsin, *Diaspora and Hybridity* (Taipei: Weber Publication, 2008, Print).

色，起詠大風歌」（〈臨江〉，頁 25），又出現擬君／臣的身份混淆。鄭經既為鎮守四方的猛士，卻起詠大風歌，此比殊為失類。帝國的意識形態不僅出現在滿／漢之辨，甚且及於《東壁樓集》內不同季節的寫作。鄭經所住之府城，在春秋二季的氣候表現並不明顯，但集內仍以描寫此二季的詩作居多，似沿襲傳統詩歌寫作範式。⁵⁵延續遺民與漢臣之比，鄭經以鮮明的忠君形象，固著帝國意識形態。儘管如此，氣候、風土的差異，仍標誌臺地之獨特性，也攸關統治身份與身處熱帶島嶼的在地經驗。類此流露嗣王心境的詩篇，或如前引〈卜居〉一詩（頁 27）。詩用周公輔政一典，疊合原初屈原意象，自喻漢臣。然而，〈卜居〉所表露了統治臺地所遭遇的困挫，遠異於遺民處境。詩意的重點之一在「世情日趨下，風景異古初」一聯，詩人試圖尋找一個服膺古代教化的理想圖景。驕悍是移墾社會的特質，欲直接複製大陸的文化經驗，未免徒勞。由風物而人情，作者在此遭遇勢不可免的文化差異，說明了異域的陌生感，當中涉及文化翻譯（cultural translation）與混雜性（hybridity）的問題。在夏琳《海紀輯要》中，永曆十八年臺灣正式進入漢族教化。原始樂土遭遇漢族禮教，臺地事物被轉譯為漢語體系，在過程中所涉及的文化不可翻譯性⁵⁶，使之帶著原有文化的印記，殘留在文本中。〈卜居〉一詩所呈現的跨文化落差，清楚體現歷史性置換的荒謬。帝國意識形態雖跨越地理屏障，東寧特有的風物與人情，仍展現自身特質，兩種不同文化的對話與互動，在《東壁樓集》中奇異的共存。

此種文化差異明顯指向地理上的遷移與分離。臺灣，孤絕於大陸東南，而鄭經始終無緣渡海，望海、眺望因之成為其筆下重要的題材。望海，是流亡的實存經驗，代指復明欲望，通過不斷延伸視野，憑弔無法復返的失落，也指稱兩地差異。試觀〈觀滄海〉中隱然湧現的欲望，可知鄭經心思，錄詩於下：

⁵⁵ 筆者據全臺詩檢索系統，檢視鄭經詩中季節以秋季居冠，春季次之，冬季再次，夏季最少。若以詩題論之，則夏季第三，冬季為末。「智慧型全台詩資料庫」（上網檢索日期：2016年7月20日。）

⁵⁶ 語言的不可翻譯，可參廖炳惠：〈後殖民與後現代——Homi K. Bhabha 的訪談〉，《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臺北：麥田出版社，1994年9月），頁 32。

蕩蕩臨滄海，洋洋渙碧波。日月若湧起，星辰盡滂沱。乘風飛巨浪，聲如發怒訶。呼吸百川水，藏納不為多。環轉連天地，華夷在盤渦。大哉滄海水，萬里未盡邁。（頁1）

開篇氣勢宏大，一筆勾勒滄海廣闊之貌，其後述巨浪滔天、聲勢驚人。詩題為觀蒼海，卻非鄭經獨創，而本於曹操名篇〈步出夏門行〉⁵⁷。〈步出夏門行〉為古樂府題，是曹操北征烏桓，滅袁紹殘留部眾，班師途中所作，描寫登上碣石山頂，居高臨海之景。加以前有秦皇、漢武登臨此山，又洪武三年（1370）六月頒〈洪武告文〉所述：「皇帝制曰：『磅薄東海之西、中國之東，參穹靈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昔帝王登之，觀蒼海、察地利，以安民。』」⁵⁸明太祖祭告山川，申明正統，充滿政治寓意，則鄭經延用此典，不無為詩集定位之意。華夷各據一端，渡海無有時也。此詩題為「觀」滄海，是欲望的凝結、召喚，卻有大海中隔。〈觀滄海〉結合歷史典故與現實政治，被編定於《東壁樓集》第一首，似乎象徵分離、流亡自此而始，也儼然宣告王者地位，可謂巧妙。此後，渡海欲望雖暫時被懸置，海的意象卻在鄭經詩集中不斷出現。

回到〈自序〉與其宣稱的忠孝之思來看，鄭經之書寫策略幾可證成一種焦慮的自我。這源自帝國話語挾帶強大的意識型態（ideology），進入詩人的敘述，產生某種「肖」似的問題。儘管與鄭成功有血緣關係，此種肖似終究是無法達到的異想，更可能引發主體的焦慮感，也在過程中不斷產生差異與滑動，成爲一種略帶滑稽的模擬（mimicry），明確表現在封號一事：南明覆亡後，使鄭經無法再接受任何聲稱正統的加冕儀式（不像鄭成功的師出有名），因此他僅能沿用其父的封號，弔詭的替代、承襲，並以此進入父親曾經主宰的遺民世界（卻也因此受到

⁵⁷ 鄭經〈觀滄海〉本之曹操，在次聯句下有評「雖本之曹語，而簡深過之」（頁1），可知也。
（魏）曹操：〈步出夏門行〉，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9月），卷1，頁353。

⁵⁸ 作者不詳：〈洪武告文〉，（明）查志隆編：《岱史》，白雲觀長春真人編纂：《續道藏》第5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12月），卷7，頁603-2。《明史》載明太祖祭告山川事甚詳，事見（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太祖本紀》，卷2，頁24。

譏嘲，如傳言以為沈光文作〈臺灣賦〉諷刺鄭經「僭越稱王」)⁵⁹。是故，「延平嗣王」一稱是意義含混、不明確的身份，意謂一種近似複製與尋求替代的內在主體。此種模擬雖賦予力量，卻也可能導致主體能動性的喪失（至少顯示為一種陰影與焦慮）。極具顛覆意義的是，在看似矛盾的雙向牽引（ambivalence）中，卻奇異的產生了鄭氏自我表述的空間——即《東壁樓集》的出現。

在《東壁樓集》的文本空間中，鄭經逆轉了主體能動性的喪失，使發聲成為可能。敘事真實與歷史真實產生歧義、斷裂，詩歌文本成為唯一解讀及詮釋自我形象的場域。在不食周粟的夷齊精神下，鄭經位居帝國邊緣（on the margin of empire）卻仍具有忠臣氣節（其終身未仕清更遠異於晚年出仕的大陸遺民），此舉可能使之重回遺民中心（center），取得發聲可能，這也是其〈自序〉的寫作意義。意即鄭氏既（可能）在遺民中心，又在帝國邊緣（margin），這種持續搖擺的狀態，同時對「遺民」與「嗣王」產生吸引與排拒，無論是在實際政治或文學表述上，隨時可能衝撞兩種話語與定義。通過遺民（中國）與嗣王（臺灣）的相互依存，從而建立鄭經的主體性與表述空間。然而，《東壁樓集》諸詩是針對失落的家鄉與文化中國而發，未必是實指。換言之，文字成為一種對抗消亡之力量，反覆提示儒家三不朽的理想標的。《東壁樓集》鐫刻在文學與歷史上，在時間洪流中，開拓出一種與過去不同的遺民論述，甚至超越其所能承載的情感與內容：它一方面透露遺民在政治選擇外的生活面向，一種由文字構築起的想像世界，另一方面也呈現出政治選擇外某種在地性的辨證與拉扯。當失去明朝正朔，鄭經《東壁樓集》承載其在文學與歷史定位的焦慮，以著述傳不朽，意味深遠。

五、結論

本文嘗試闡發鄭經在遺民文學與臺灣文學中的意義與位置，並借用寫作策略、

⁵⁹ 翁佳音論及其時對鄭成功的評價不一，例如黃宗義以其私藏明之宗室，是為私心建國。詳見翁佳音：〈史實與詩：明末清初流寓文人沈光文的虛與實〉，《文史台灣學報》第7期（2013年12月），頁9-38。

遺民符碼、話語、離散、認同等概念與詩作意象，來分析《東壁樓集》的詩語表現、意象營造與對話空間。鄭經一方面因種種歷史緣由，獲得原先可能無法擁有的王位——「嗣王」；另一方面又背負著國族的沉重包袱，成為「明遺民」。當其沿用父親的封號，終究指稱一種無法達到的模擬異想。然而，也在看似矛盾的雙向拉扯中，奇異的產生了鄭經自我表述的空間。鄭經對他者的指認與辨別，體現在帝國意識形態進入後的遺民心志，並藉由臺地資源，想像逝去的帝國，其所開展出的主體性無疑是彼此相互建構的結果。進一步釐清鄭經〈自序〉對讀者的指導，將可理解「遺民」與「嗣王」雙重身份，及其引發的焦慮與某種矛盾、協商性的主體，亦極能代表其複雜立場。《東壁樓集》這部充滿懸念、焦慮的個人詩集，在三藩之役的歷史時刻，以諸種文學符碼建構自身形象，預示其在文學圖譜的位置，然卻因種種巧合，無疾而終，未嘗不為後人之憾。

鄭經《東壁樓集》移植儒家文化政策，以模仿中原（明朝），卻以其混雜了在地性，與原始中國遺民詩（論述）保持永恆的距離感，使之無法等同同時期的明遺民論述，而成為歷史的特殊產物。換言之，此種新興的遺民論述，無疑是混融臺灣在地性與中原遺民傳統論述的集合體。鄭氏既在遺民中心，又在帝國邊緣，通過遺民（中國）與嗣王（臺灣）的相互依存，又巧妙建立起其主體性。鄭經《東壁樓集》展現文化敘事再建構之餘，既能補充遺民文學與臺灣詩學的相關論述，也極有潛力顛覆其中固有想像，有待日後開展。

徵引書目

（一）引用古籍

（戰國）屈原著，黃靈庚集校：《楚辭集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1月）。

（魏）何晏著，（宋）邢昺疏，（清）阮元校勘：《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

（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晉）司馬彪補志：《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5月）。

（明）查志隆：《岱史》，（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12月，白雲觀長春真

人編纂：《正統道藏·續道藏》第 59 冊）。

（明）鄭經：《東壁樓集》（臺北：龍文出版社，2011 年，《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八輯）。

（清）彭孫貽：《靖海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 2 月）。

（清）郁永河：《裨海紀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

（清）高拱乾：《台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6 月）。

（清）夏琳：《海紀輯要》（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

（清）汪鏞鍾：《明延平忠節王始末》（北京：線裝書局，2003 年 10 月，據清末至民國間抄、民國 23 年朱希祖校改本影印）。

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年）。

（二）引用現代出版專書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 年 11 月）。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4 月）。

高文惠：《後殖民文化語境中的庫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 7 月）。

張曼濤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八）台灣佛教篇》（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

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12 月）。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9 月），卷 1。

廖一瑾：《臺灣詩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 3 月）。

嚴志雄：《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臺北：聯經出版社，2012 年 5 月）。

龔顯宗：《臺灣文學論集》（高雄：高雄復文出版，2006 年 10 月）。

Karla, Virinder S., Kaur, Raminder, and Hutnyk, John, Trans. Chen Yi-hsin, *Diaspora and Hybridity* (Taipei: Weber Publication, 2008, Print).

(三) 引用論文

1. 期刊論文

- 呂玉新：〈有關朱舜水研究文獻目錄〉，《漢學研究通訊》第23卷第4期（2004年11月），頁21-37。
- 阮筱琪：〈論鄭經《東壁樓集》中的孤獨感〉，《有鳳初鳴》第5期（2009年10月），頁117-128。
- 唐立宗：〈渡海東來忽幾秋：明清之際渡臺文士的見聞與際遇〉，《臺灣文獻》第65卷第2期（2014年6月），頁115-157。
- 孫慧敏：〈天下興亡，「匹夫」之責？——明清鼎革中的夏家婦女〉，《臺大歷史學報》第29期（2002年6月），頁63-85。DOI:10.6253/ntuhistory.2002.29.03
- 翁佳音：〈史實與詩：明末清初流寓文人沈光文的虛與實〉，《文史台灣學報》第7期（2013年12月），頁9-38。
- 郭宏珍：〈古代官方祈雨考述〉，《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1期（2012年2月），頁70-77。
- 曾玉惠：〈鄭經詩歌作品中女性形象分析〉，《崑山科技大學學報》第5期（2008年3月），頁113-136。
- 楊玉成：〈小眾讀者：康熙時期的文學傳播與文學批評〉，《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9期（2001年9月），頁55-108。
- 楊玉成：〈後設詩歌：唐代論詩詩與文學閱讀〉，《淡江中文學報》第14期（2006年6月），頁63-131。DOI:10.6187/tkujcl.200606.14-4
- 楊宏任：〈何謂在地性？：從地方知識與在地範疇出發〉，《思與言》第49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5-29。
- 楊惠南：〈明鄭時期臺灣「名士佛教」的特質分析〉，《臺灣文獻》第53卷第3期（2002年9月），頁1-38。
- 鄭文惠：〈後遺民時間／地理政治學：溥心畬台灣風物之文化敘事〉，《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13期（2013年2月），頁1-60。
- 魏正申：〈對陶學兩大癥結——「隱逸」與「忠晉」的創釋——鐘優民先生治陶

貢獻論》，《九江師專學報》1995年第4期（1995年），頁3-8。

蘇怡如：〈杜甫成都草堂詩之隱逸書寫析探〉，《國文學報》第53期（2013年6月），頁119-147。

釋慧嚴：〈台灣佛教史前期〉，《中華佛學學報》第8期（1985年10月），頁273-314。

2. 論文集論文

王偉勇：〈鄭經《東壁樓集》借鑒唐詩析論〉，《詩詞越界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9年），頁141-193。

朱鴻林：〈鄭經的詩集和詩歌〉，《明史研究》第四輯（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12月），頁212-230。

李惠儀：〈明末清初流離道路的難女形象〉，王璦玲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年10月），頁143-186。

李慶新：〈「海上明朝」：鄭氏河仙政權（「港口國」）的中華特色〉，《濱海之地：南海貿易與中外關係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4月），頁339-353。

黃美娥：〈臺灣古典文學發展概述（1651-1945）〉，《海峽兩岸臺灣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2004年8月），頁432-433。

廖炳惠：〈後殖民與後現代——Homi K. Bhabha的訪談〉，《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臺北：麥田出版社，1994年9月），頁21-25。

3. 學位論文

吳翊良：《南都·南疆·南國——南明（1644-1662）遺民詩中的「南方書寫」》（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3年1月）。

黃騰德：《鄭經詩歌研究——以〈東壁樓集〉為探討重點》（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謝崇熙：《清初明遺民的「屈陶」論述》（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2008年6月）。

蘇奕璋：《明鄭時期臺灣遺民詩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

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6月）。

（四）引用電子資源

「智慧型全台詩資料庫」（<http://xdcn.nmtl.gov.tw/twp/b/b02.htm>）（上網檢索日期：2016年7月20日。）

Diaspora, Empire and Successor Condition: A Study of Zheng-Jing's "*Dong Bi Lo Ji*"

Lin, Jin-Yu

Ph.D.,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centers on "*Dong Bi Lo Ji*" by Zheng Jing, the son of Zheng Cheng-kung, who ruled Taiwan in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By analyzing Zheng Jing's writing strategies, the symbolisms and the images of the verses, we can see how he positions himself through his dual identities——"diaspora" of the Ming Dynasty that formally ceased to exist in China in 1644 and the "ruler" of the island of Taiwan. Struck between diaspora as a political reality and as a state of mind, Zheng uses beliefs of Confucianism and diverse writing strategies to lead readers into his literary world. He tries to find his own position 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nd eventually liberates from his own subjectivity. Through the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China) and the island (Taiwan), Zheng Jing successfully dissociate as a Ming loyalist and a ruler in Taiwan.

Keywords: Zheng Jing, "*Dong Bi Lo Ji*", Diaspora, Loyalist, Locality